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第十届会议

2000 年 2 月 12 日至 19 日，曼谷

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的高级别圆桌会议

“21 世纪的贸易和发展方向：学术界的看法”

摘 要

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 不作为正式记录

2000 年 2 月 12 日在曼谷举行的贸发十大的第一项活动是同知名学术界人士一起举行的高级别圆桌会议，这些学术界人士在会上谈了对过去 50 年的成就与失败的看法，以及关于这些成功与失败对发展战略和国际安排和组织的影响的看法，包括关于贸发会议作用的想法。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里库佩罗先生宣布 21 世纪贸易和发展方向问题圆桌会议开幕，他说，在非歧视基础上进一步宽放贸易的动向是否符合穷国的发展愿望这一问题今天仍在困扰着公众舆论。这一点明显地从在西雅图发生的各种群众示威中表现出来，这些示威在“发展”和“环境”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协助成员政府谈判进一步实行贸易自由化的世贸组织。

在进一步宽放贸易与争取发展这两者的关系背后的问题早在 1947 年为准备哈瓦那贸易会议而进行的日内瓦讨论中即已出现。当时，欠发达国家认为，经济结构中的不对称状况与要求所有国家承担同等责任的贸易制度是不合拍的。今天，这些不对称状况非但并未消失，反而因全球化进程而更趋严重。而 1997 年 7 月在泰国

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表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并举可带来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而这种后果的不利影响仅触及发展中国家。

里库佩罗先生认为，现在应当重新思考贸易与发展问题，并应提出一个问题：能否找到新的方向，以期实现调和多边贸易自由化与希望这种自由化的国家的成功发展这一目标。他说，贸发十大要进行正式的政府间讨论，而经常与贸发会议配合工作的非政府伙伴的参与可从许多方面丰富这种讨论。因此，邀请了研究发展问题的学术界的一些杰出专家，请他们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迎接新世纪，请他们重点说明能为贸发会议的目标——进一步放宽贸易以及实现发展——指明正确方向的政策信息。他说，每一位专家都带来了自己的观点，并非每一种观点都会得到贸发会议的赞同；在有些观点上，专家们自己就有分歧，而专家们总是这样的。然而，会出现一些难忘的主题，它们会在会议的讨论中以及在今后的四年内不断引起共鸣。

专题讨论人的发言

Bernard Chavance 教授(巴黎大学，法国)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从 20 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经济制度的对抗中能汲取什么教训；第二，以过去十年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中能汲取什么教训。他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方面互为对立面，另一方面却又相互影响对方的发展方向。他说，如果说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失败的是社会主义所明确宣布的目标，即，通过一种进步的经济制度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无法顺应变革以及它对革新构成的系统性的障碍。不过，他又说，虽然历史判定资本主义获胜，但 20 世纪的结果实际上是含混的：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与之相随的则是穷国依然落后于较富有的国家。经验证实了凯恩斯着重指出的资本主义内在的三大缺陷：不稳定、社会不平等和失业。Chavance 教授强调，效率、公平、团结互助和自由并非完全匹配：它们意味着难题、妥协和有得有失。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对于社会主义崩溃后，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评价仍有其现实意义。

他认为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可汲取三个教训：一是纯经济的转型观过于狭隘。经验表明，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制度转型的核心，既决定制度能否持续，也决定制度的合理性。第二个教训涉及转型轨迹的多样性，诸如：中欧

的以社会问题和欧洲区域为中心的道路、俄罗斯出现的衰退加政府危机型轨迹以及中国等一些国家选择的渐进、高增长道路。他说，由此看来，转型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

第三个教训涉及政府在成功转型中的作用以及政府主动参与转型进程的必要性。他最后说，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次，都必须就具有合法地位的机构制订的规则以及如何顺应这些规则达成一致。

Carlota Perez 女士(独立顾问，加拉加斯;荣誉研究员，苏塞克斯大学，联合王国)说，发展就是社会对技术能力的掌握。随着知识社会在当今世界的形成，在发展方面有三个基本教训。

第一，成功的发展战略今天是——而且一向是——成功的技术发展进程，这就意味着要大力掌握技术。成功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来讲，是成功的学习过程，具有改造、适应、改进外来技术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全面创新的能力。日本和亚洲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追赶先进水平与掌握技术之间存在深刻的、根本性的关系。这个重要教训在政策方面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技术必须占据发展战略的核心，而不能被放在边缘。决不能再将技术视为仅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再将技术完全归在科技专家的业务领域。技术必须成为发展进程中政府和工商界最高领导人的主要关心事项之一。

从近期情况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是，快速增长与发展不能相互等同。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关键的差别在于技术能力，决定成败的真正关键既不是自由化程度、也不是政府减少干预的速度或宏观经济调整的深度，而是技术学习的取向和强度。因此，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快速的成长进程并不一律能实现赶上先进水平或实现发展，而且快速增长进程未必不会发生逆转。但是，快速增长时期对于为以后的前进创建跳台是至为重要的。

第三个教训关系到成功的成长和/或发展进程。这些进程可大致发生在相同时期，其基本要素往往相似。这种情况决非偶然。这意味着发展机会取决于同时影响所有国家的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意味着核心国家的情况与边缘国家启动或继续发展进程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除前苏维埃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外，过去 50 年成功的成长和发展进程是积极进取的——核心国家的条件创造了发展的机会，而具有适当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则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总之，发展的机会是一种移动中的目标，因为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到今天就会行不通，今天行得通的办法到明天又未必行之有效。成功的发展战略能顺应具体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即便是传统工业也已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也正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典型情况。

今天，每个社会都需通过适当的组织工作大幅度提高技术吸引能力。在这方面，国际社会需停止围绕国营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无益辩论，应当开始按现代要求重新设计国家的强大作用，使之能促进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和对市场的恰当运作发挥监督作用。Perez 女士强调需有一个多层次的国家组织，在全球、国家和国家以下各层次之间切实发挥沟通作用，这种组织要能从全球着想，从地方入手。

她提到技术吸收能力或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并表示认为，“知识社会”的最基本含义并不在于知识生产的速度或数量，而是在于全体公民能广泛地掌握知识。

Kwesy Botchwey 先生 (哈佛大学，美国)谈到发展融资问题，这是较贫穷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十年在国际金融结构中基本上被忽视的问题。他强调，这些穷国的关注主要还不在于如何对付短期资本流量变化不定造成的混乱，而是在于如何吸引资本，尤其是吸引长期资金，以支持较快和持久的增长。他指出，举例而言，过去十年大幅度的资本涌流助长了一种看法，认为正常的市场运作即可大致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需要。然而，现实情况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中等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总体来说未能受益。另外，尽管官方发展援助仍是低收入国家外来资金的最大部分，但过去十年也已减少。这一情况再加上低收入引起的国内资源调动率低下，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成为世界上最缺乏资本的区域。这两个区域融入世界金融市场的程度也最低，而且严重依赖正在减少的援助流量。

Botchwey 先生说，这突出表明需减免债务，减免债务可鼓励私人投资流量，同时腾出资源用以推动国内投资，特别是在社会部门的投资。他提到在科隆议定的重债穷国计划的重要变动，同时指出了与重债穷国计划合格标准有关的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难以预测问题。他认为，扭转趋向的主要责任仍在于发展中国家，它们需要采取政策推动增长、加强竞争力和帮助吸引外逃资本返回。但是，在国际舞台上

也需采取行动，以扩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参与、改善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迅速采取债务免除措施，并为低收入国家调动和输送长期资本创建新的途径。

Frances Stewart 教授(牛津大学)强调，收入分配对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它会影响社会凝聚力、决定在某种人均平均收入条件下的穷困程度以及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乃至影响人民的健康水平。她提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促进更平等的增长的战略看来既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强烈趋向。为此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包括贸易自由化、技术变革，以及较一般而言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影响。

她说，高度的不平等会转化为阻碍增长的因素，因为这种不平等引起政治动荡不定，因而采取投资减少、增长减慢。Stewart 教授为实现更平等的增长提出了六项战略：(一) 重农战略和旨在提高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战略；(二) 加强就业战略；(三) 提高教育水平和普及教育；(四) 资产重新分配(如：土地改革)；(五) 政府为帮助穷人而采取的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六) 通过提高税收和公共开支改善税后分配。Stewart 教授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高平等程度可促进发展，而实际趋向却正相反。她的结论是，协调一致的区域行动和更好的国际行动有助于促进平等，又不致削弱参与竞争的能力。例如，在区域一级协调国内税收和福利既有助于改善分配，又不致损害竞争力，在区域一级按合适的水平协调最低限度工资也是如此。她最后说，全球经济环境要求作出全球社会对策。

Deepak Nayyar 教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新德里，印度)强调，发展必须带来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以及在通常的经济关注中常忽视这一点。先紧缩后繁荣的办法已不再是一种可接受的选择。尽管经济进步巨大，但各国之间各国内部的发展并不均匀。因此，在一个不平等伙伴的世界中，国际经济往来的游戏规则在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在结果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这方面着重指出三点。第一，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规则，国界对贸易和资本流动当不致有什么影响，但技术流动与劳力流动之间是有明确界线的。第二，有些规则仅针对一些国家而不针对另一些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规定的条件就是如此。第三，旨在制订新规则的议程表现出倾向性，旨在制订多边投资协议的尝试就是如此，这种尝试想为外国投资者争取权利，却不要求其承担义务。全球化再

加上这些不对称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制订经济政策的自主权。

Nayyar 教授说，没有国家愿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那么选择也就是在市场驱动的被动插入世界经济与民族国家可以发挥作用的有选择的战略融入这两者之间。理智的办法应是后者。在国际方面，国家必须努力影响游戏规则，使其结果更加公平；应给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以使其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参与者。

在国内方面，国家必须努力创造各种先决条件，确保更加平等主义的经济的发展。两个战略办法最为重要：积极预防排斥的办法寻求发展各种机制和政策，确保广泛地分享发展的好处。这就要求将社会政策纳入经济发展战略。第二种办法的特征可以说是反应性质。它将抑制排斥的不利影响，提供社会安全网。现在是就发展问题形成新共识的时候了，应当象关心效率一样关心公平，象关心经济增长一样关心社会进步。重点必须从经济转向人民，从手段转向目的。

Ipppei Yamazawa 教授(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日本，东京)强调，全球化进程无法停止，因为它并非产于国际货币基金或世贸组织，而是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企业活动的结果。因此，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各国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使其好处最大化，不利影响最小化。为了成功地响应全球化的挑战，必须设法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制定政策规定。

在国家一级，国内机构在实施立法、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应提供社会安全保障网，帮助全球化的亏败者。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应通过改变全球制度帮助各国政府的努力。

并非所有发展中经济国家都能够自己有效地实施国内改革，因此它们需要了解其当地需求和现实者的帮助。在这方面，区域集团可以发挥作用。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构成的亚太经合会议有一项独特的议程，将自由化努力与设施(即简化海关手续、统一规则 and 标准)及经济和技术合作结合起来，以开发人才资源，提高科学和技术水平。它们既可帮助保证受到最近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稳定地复苏，又可避免再次发生危机。

有些亚太经合会议成员还愿向非成员提供帮助。在这方面，他提出，贸发会议可以发挥催化作用。国际社会可以最好地利用区域合作，将其用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回应全球化挑战的手段。

Alfred Maizels 博士(牛津大学)谈到商品依赖问题，他着重指出，商品部门对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具有关键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口都倚赖商品部门。但是，他说，这一部门本身的进展严重倚赖世界商品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商品价格的变化。他指出，目前商品价格下跌比 1930 年代大萧条时还要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因此，倚赖商品的国家面临很大的贸易条件损失。从而严重限制了其增长潜力，损害了其国内政策改革、债务重组和外资动员的努力。

他补充说，他认为，过去 20 年，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没有在贸发会议或任何其他国际论坛得到认真的审议，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清偿问题在此期间持续恶化。他认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共同战略，处理定价问题和与倚赖商品的国家相关的问题。

这样一个战略应当基于三项原则：（一）自由市场和市场规范机制的明智组合，适当地用来实现商定的目标；（二）区分不同类别的价格问题（如压低的价格水平、多年价格周期和短期波动）；和（三）考虑商品问题与其他部门、特别是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他最后说，现在的贸发十大提供了一个机会，认真地考虑贸发八大上提出的举行联合国商品会议的提议。

Alan Winters 教授（萨塞克斯大学）在讨论作为发展政策的贸易政策是说，他相信，自由贸易仍然是加强发展的最好方法，开放和不歧视仍应是我们将来的口号。他解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理论和实际决策环境中，自然出现了进口替代。地方工业需要强有力的保护，并为关贸总协定下的特殊和区别待遇提出了有力的理由。他相信，自由贸易更可能导向发展，因此，简单、透明和可预计的自由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尽管不能忽视自由化的不利影响，但也不能假装贸易改革不伤任何人，不应当让改革方案成为某些亏败者的人质。自由化难以捉摸的时机和次序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应当有适当的补偿政策。

Winters 教授还对发展中国家区域贸易安排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很可能在产生贸易时也产生贸易偏离。他指出，缺乏充分地衡量贸易制度的手段。因而无法适当评估各种政策制度，没有能力确定在哪个阶段政策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他认为，没有能力衡量贸易制度是难以确定性地证明开放对经济最好这一问题的核心。因此

他认为，贸发会议——它已在提出贸易政策数据——应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包括通过分析工作为这些数据设计衡量方法和分析性综述。

Alice Amsden 教授(麻省理工学院)谈到工业化晚的国家——包括制造经验不多的国家和在过去 50 年中成功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国家——能否在世贸组织规则之下继续建立其制造部门的问题。她认为，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各国促进其制造部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继续通过补贴研究与发展、区域发展和环境保护努力提高其工业竞争力。此外，其新兴各公司受益于为在科学园区和工业园区落户而提供的特殊刺激。而且，世贸组织在关税方面并非不灵活，因为其提供保障及反倾销措施和针对各种进口的保护措施，如果这些进口达到了危及国际收支的水平。

这并非贬低发展中国家对世贸组织所表示的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涉及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包括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和环境。但她认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不乏可用的方法在世贸组织制度下促进其工业。她还指出，为了促进工业，各国可利用成功的工业化国家采用的“相互控制机制”，以确保对企业的补贴和其他资助得到有效利用。这些资助与可监测的面向结果的绩效标准相联系。在世贸组织之下仍有可能采用此类措施，尽管各国政府在确定作为补贴条件的出口目标方面更受限制，而且当地含量要求在禁止之列。

Peter Evans 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说，新千年的头 25 年是机构建设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机遇。他解释说，全球政治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流动和市场交换之上，但也是建立在一套错综复杂的规则之上，其维系和执行需要全球和国家一级的具体组织。他谈到，需要伴有强有力的机构的规则，以便能有一个可以预测的环境。除非在机构方面得到解决，否则不平等和动荡问题就将更加恶化。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和交换安排的复杂变化速度远远快于管理机构框架的变化。而且，现有的全球管理组织仍然处在其组成阶段。

他说，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设立与旨在社会保护的国家机构的加强相匹配。以国际开放为目标的机构框架同以社会保护为目标的机构框架相结合，就有可能使开放具有社会方面的益处，从而具有政治可行性。但是，这些机构不够充分，因为它们主要使北大西洋先进工业国的公民受益，也没有预计到技术和经济的变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世界经济的开放和削弱社会保护的方面。

他认为，机构建设的新高潮应当确保各种好处遍及全球，确保社会保护和开放之间的平衡问题得到解决。实现这些目标会保证开放在社会方面有利，在政治方面具有合法性。**Evans** 教授谈到创造性的机构建设方面的各种障碍——对世贸组织的反应就是这种混乱的一例。他说，现有机构的毁灭并不能使我们回到某种神话般的过去。在一个对较强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权力有节制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会更好。而且还存在有修改规则的机会。

在形式上，世贸组织提供了民主决策程序，但在实际上，决策与其说是民主决策不如说是寡头决策。发展中国家在西亚图及先前在总干事选举中都表明了，正式的表决权可以产生非正式的权力。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理由使某些建立协商一致意见的手段制度化，以便利用世贸组织某些特点中所含的机会。这可能需要机构创新，也可能涉及更好地利用贸发会议等现有全球组织的潜力。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重塑全球化的制度，而不是使自己顺从于一个据称不可变更的全球化制度。

Hans Binswanger 先生(世界银行，华盛顿)谈到为什么农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乡村增长和乡村减贫如此重要这个问题。他说，农业部门可以使乡村地区持续增长，可以使乡村减贫得以实现。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增长慢于一般贸易。由于针对其农产品的巨大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在农业方面未能得到象在工业方面那样大的贸易增长份额。从而限制了发展中世界的农业增长和多样化。

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尤其是工业国的农业保护主义——继续使发展中世界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超过对纺织品贸易限制的三倍。

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其农业政策改革，同时它们还必须在下一轮世贸组织谈判中注重减少对农产品贸易的限制。出口补贴应当取缔，国内生产者补贴应当减少，关税配额下的准入应当增加，加工农产品关税升级应当取消，进口农产品约束关税水平和离差应当降低。

Binswanger 先生相信，贸发会议应在与世贸组织、粮农组织、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中界定其职能和工作方案。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贸易和相关问题论坛；保持与贸易有关的数据库并提供信息；进行高质量的分析；在准则和标准及争端解决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在发达国家宣传更好的市场准入；以及帮助建立联盟，寻求多边贸易谈判中共同的发展中国家立场。

随后的讨论

专题讨论人发言之后的简短讨论强调了人的发展和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国家的关键作用、技术能力建设、以及全球管理的关键作用，全球管理应当补充而不是代替国家管理。关于全球化的评论突出表明了对有关不平等和边缘化问题的担忧，特别是有关收入分配问题。还强调了社会问题。有人提出，应当给重债国家和依赖商品的国家以特殊待遇。有人对关于减少政府干预的一些发言作出了反应，说在工业革命期间，强大的国家对那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强大的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很有必要。还提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缺陷，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鼓励强者生存。关于技术发展，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技术。

关于乌拉圭回合协议，人们指出，它们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所期望的好处，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提出的“积极议程”甚至没有得到考虑。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发达国家之间实质性意见分歧的结果。多边贸易制度的规则包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努力条款，要使其更加有效，更具法律约束力。人们主张一个真正公平的贸易制度，以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

-- -- -- -- --